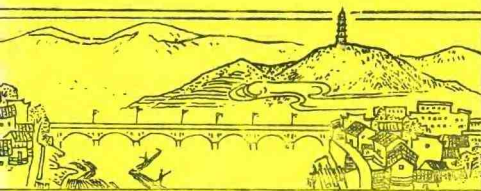


12.09

补门文史

第一辑

85



祁 门 文 史

第 一 辑

JL251/12



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12月



祁门文史

第一版

(内部发行)

皖非出版字(86)2007号

徽州新华印刷厂印

1985年12月出版

32开本、字数120000

印数1—1000



封面题字：张恺帆

尾花设计：方春荫

封底篆刻：倪望铎

前 言

耿存海

祁门地处安徽省的最南部，西南和赣东北接壤，东与休宁、黟县交界，西北同东至、石台毗连，面积二千二百五十七平方公里。峰峦起伏，河流纵横，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物产众多，资源丰富。所产“祁红”驰名中外，林产以松、杉为著，矿藏尤以瓷土闻名。全县十七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以稳健的步伐，跨入四化建设行列！

祁门自建县以来，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耕作、收获、生息、繁衍。他们经历了峥嵘坎坷的岁月，漫长曲折的道路，艰苦卓绝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史料。这些都亟待我们去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使之有益于当代，惠及于后世，这是当今伟大的时代赋予我们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

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撰写文史资料，我们是以“存真、求实”的精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自戊戌变法至文革以前，凡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工商、民族、宗教、外事及社会风貌、乡土人

情、三教九流、人物轶事等均属征集范围。征集重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群众革命斗争方面史料，“敌”“友”方面史料。对本地的名山胜水、古史今谈、社会逸闻、民间传说也酌情兼收。并通过印发和交流，求得读者和文史工作者的充实和匡正。

韶光似水，日月如梭，抢救史料乃当务之急。承蒙各级领导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两年来，我们征集史料一百余篇，二十余万字，编出本期文史资料。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在编辑中定然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敬希读者批评指正。并请各界人士继续撰稿，俾使文史资料不断编辑印行。

《祁门文史》第一辑同大家见面了，尽管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还不完善，但它却是这块土地上萌发出来的幼芽。亲昵的乡音，浓郁的乡情，历史的写照，将使大家产生联想和回顾。愿全县人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给以精心培育和热情扶持，使它在振兴中华，建设祁门的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前言	耿存海 (1)
民族实业家康达	郑志锡 (1)
陶行知先生安葬略记	郑郁予 (17)
我的父亲胡术五	胡初云 (19)
回忆祁门妇女界先进倪畅予	陈必旼 (25)
陈毅来到舍会山	方凤、徐家兴 (29)
皖赣边区斗争的回忆	李步新 (36)
皖南民众总动委会祁门县分会简况	方凤、徐家兴 (41)
解放祁门前后	洪世发 胡国进 (45)
在我一生经历中所相识的	
祁门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	陈必旼 (51)
“去思碑”之来龙去脉	倪望铎 (64)
太平军在祁门	叶露孜 (69)
北洋军阀溃军扰祁记	谢振道 (76)
祁门县历代兵事概览	方正 (79)
解放前祁门的封建宗族和佃仆制	秀 毅 (83)
解放前祁门的苛捐杂税	曹自强 (87)
祁门人民一次抗税斗争	方家瑜 (90)
祁门地区八百年自然灾害辑录	方修教 (93)
历史上祁门人口的变迁	方家瑜 (100)

清末民初祁门教育概况·····	郑郁予(103)
解放前祁门的商会·····	许立予口述 胡益谦整理(108)
祁门红茶生产史略·····	胡益谦(111)
漫话祁门瓷土·····	胡益谦(115)
祁门绿色的宝库——牯牛降·····	成文法(123)
祁蛇·····	徐 焘(125)
郑之珍的日莲戏·····	郑建新(137)
郑之珍籍贯考·····	倪国华(144)
祁门宗教史略·····	吴德良(148)
祁门方言·····	胡术五遗稿 胡初云整理(152)
贵溪村的婚礼旧俗·····	胡益谦(156)
祁门名菜“中和”·····	郑安宽(159)
《姐妹看灯》上北京·····	倪国华(161)
梅城溯源·····	戈 贝(162)
梅城十二景篆刻·····	胡晓星(164)
祁门建县经过·····	方家瑜(166)
祁门县建置沿革表·····	方修教(170)
祁门掌故地名轶说·····	卢子威(174)
祁门古桥古渡·····	交通志编写组(177)
闽江双桥及其修建史略·····	倪永华(182)

民族实业家康达

郑志锡

康达，原名特璋，祁门县礼屋村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三月，卒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享年七十一岁。

礼屋，在祁门县倒湖村北三里，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背北朝南，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大北水流经村前，在倒湖与阊江汇合，西南流入江西鄱阳湖。

康达的父亲康松筠，同治末年出任江西省乐安县知县，因为官清正，不会阿谀逢迎，得不到升迁，四十多岁便弃官归田。回乡时两袖清风，连脚夫的费用都是借债开销的。他从乐安县带回一株四季常青的柑兰树栽在园地里，表示自己的不同流俗。

康达的母亲汪节，祁门县查湾人，为人忠厚。生二子，长子即康达，次子名伊乔，比康达小四岁。因家境困难，伊乔幼年便出继族人为嗣。没多久，康达的父亲病故，从此寡妇孤儿，相依为命。

康达自幼聪明好学，四五岁就去本村私塾门前谛听学生读书，先生讲学，回家后居然能背诵几句《三字经》、《百家



姓》或《千字文》。不久他好学的事，引起了他的叔祖父——礼屋村康氏族长康水心的关注，并送康达上学，一切费用都由康水心负担。康水心又名移山，后人称他移山公，比他的侄子康松筠反而小几岁，与康松筠的父亲康玉成是堂兄弟。康水心拥资巨万，自幼读书，能诗能文。康达后来入塾攻书并有成就，同他叔祖父康水心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是分不开的。

康达七岁入学读书，十二岁到县城应童子试，一举得捷，中了秀才〔1〕。十六岁在族人支持下与邻村奇岭口郑姓之女末璋完婚。婚后生育二男一女，长子尚璜、次子定东、女尚武。郑末璋支持丈夫康达继续上进，在家侍侯婆母，抚养子女，不憚辛劳。为此，后来康达为她改名“利璋”，以志不忘。由于过度劳累，利璋只活了三十九岁，便尔长逝。康达之妾邓传宣，江西波阳人，居九江，识文字，起着康达私人秘书作用。她一生不曾生育，一九六八年在江苏丹阳的裔孙康大道家病逝，一九八三年由孙媳妇黄润卿将她的骨灰护送回籍，在礼屋安葬。

一八九三年，康达婚后，就到省城安庆入安徽大书院继续深造〔2〕。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知识界的一些先进人物开始向西方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较早的如魏默深，龚自珍辈，于晚清思想之解放，都甚有功。康达就读于安徽省大书院时，除学《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外，还有魏氏的《海国图志》〔3〕。魏默深与龚自珍同属今文学派，主张“通经致用”，当时省大书院讲授《通鉴》等书，即为“致用”。魏氏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龚氏则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因而极力提倡“更法”、“改图”，这些都不能不使康达受到影响，并使他大开眼界。那时，清政府腐败至极，一八九四

年甲午战争爆发，被日本击败，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一年康达回到礼屋，把国家民族的危亡告诉乡邻父老，由于少年气盛，言辞激烈，有悖封建秩序，触犯“族法”族老扬言要将康达处死。经同宗的碧桃村众人与岳父家营救资助，仓皇出逃。

二

康达远离家门，几经周折，一八九六年到北京通艺学堂学习(4)。

光绪丁酉年(一八九七年)拔贡第一名。因他留心新学而被光绪帝破格任命为内阁中书。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丁在京的许世英(东至县人)、吕调元(太湖县人)和许承尧(歙县人)等皖籍人士，并与许世英、吕调元结为盟兄弟。同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因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疯狂镇压，这次变法仅历时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其结果是光绪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康达亦因“参与其事”而“几罹于难”(5)，被贬到景德镇御窑监制御瓷。这一经历使他终生与瓷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〇四年，在许世英等好友相助下赴日本留学，希望效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以摆脱民族危机，使中国强盛起来。从戊戌变法失败，他被贬到景德镇监制御瓷以来的六七年中，康达逐渐了解了景德镇的瓷业，用手工制作，用松柴烧瓷，产品的成型，其大小、厚薄，全仗工人

的技艺；与机器制作相比较，不但效率低，成本高，成品之大小厚薄往往难于画一。而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就用机器制瓷，用煤烧瓷了。因此，康达到日本发愤攻读工业、经济、兼及军事。

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康达参加了同盟会〔1〕。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非常恐惧，照会日本政府采取强烈措施限制同盟会的活动。大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逐回国，没有完成学业的康达也随着回国了。

康达回国以后，即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一九〇七年他在上海参与于右任先生创办的《神州日报》馆〔2〕，利用报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鼓吹革命思想。他极力鼓吹走工业救国，发展经济的道路。一九〇九年宣统帝登基，康达流寓江西景德镇，以前朝“内阁中书”身份，呈奏朝廷，为首发起成立景德镇总商会，并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3〕。

一九一〇年，康达在景德镇主持创办江西省瓷业公司。这个公司是官商合办的，官方有河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五省投资；商方是张季直〔4〕，共投资20万元（银元），并把御窑的一切设施收归瓷业公司。该公司设本厂与分厂，本厂设于景德镇，用旧法制作；分厂设于波阳改用新法生产，即用机器制坯，用煤烧制瓷器〔5〕。辛亥革命以后，官方、商方投资中断，便由康达独家经营。康达又在九江开设一个瓷器店，经过九江把产品运往全国和世界各地。抗日战争前夕，这个瓷业公司有工人1500多人，分两条线生产：粗瓷用机器制作，由于机器比较原始，操作技术也不高，所以细瓷仍用手工制作。一九一九年，祁门瓷土引起国际工商业者的注目，上海瓷商争购祁门瓷土出口。康达凭借他当时的国务院谘议的身份进行干预，挫败了上海商人向海外倾销优质瓷土，从中牟利的野心〔6〕，使祁门瓷土不致落入

外国人手里,保持了江西瓷业的资源优势。从此,祁门瓷土源源不断地运入瓷业公司,使瓷业公司的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不久,其产品赴美国圣路易斯赛会展览,获得国际好评〔12〕。

抗日战争中,瓷业公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大伤元气,这个公司,一度是我国瓷业界最大的企业。在生产工艺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技术,又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制瓷的先进经验,开辟了瓷业发展的新纪元。

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保守势力是相当顽固的,要冲破保守势力也并非易事,必须加速培养和扩大技术力量。康达有见及此,便从教育入手,开办学校,培养人才。一九一〇年创办瓷业公司不久,即与张浩〔13〕集资在江西波阳高门镇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陶业学校。该校是厂(瓷业公司分厂)校合一,体制与中技相仿。第一任校长就由张浩担任。课程设置分技术、艺术两组。技术组课程有陶瓷、矿物、燃料、筑窑等,外加原料、坯釉、颜料等实习,并有成瓷,烧窑实验场地。艺术组有国画、西画、饰瓷、陶瓷概论,并有粉彩、新彩、刷花、绘相等实习,在教学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校学生约有200人,教职员工有二十多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研究实验改革制作瓷器服务的。从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该校几经易名、搬迁,一九四三年迁入景德镇,一九四五年升格为“江西省立瓷业专科学校”〔14〕。这所学校从始建到结束,经历了四十个春秋,一九五四年撤销。它为我国培养瓷业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达也被誉为景德镇瓷业界先进人士载入史册〔15〕。

康达早年在安庆和北京学习期间,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后来又参加了戊戌变法这次失败的斗争实践,便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在兴办陶业学校之前,他已热心在家乡兴办小学,

而这正是戊戌维新所极力提倡的。一九〇四年去日本留学前，他把康永心赠给他的设在祁门平里的“会同康”茶号捐赠桑梓办新学，使祁门县第一所新学——梅南学校得于一九〇五年正式成立，这是祁门县新学之嚆矢。一九一八年梅南学校校舍部份遭受火灾，康达又把价值500元的地皮捐赠给学校，使该校校舍很快地在原地上重建起来。康达既是废科举，办新学的先锋，又是积极集资办教育的典范。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奖给康达银质褒章一枚^[16]，以示表彰和鼓励。为褒扬先辈热心办学精神，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梅南小学为建校八十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校内悬挂了康达遗像，并邀请现居本县和邻省的康达的后裔孙女媚德、汝华、汝旺及曾孙女怡红前来参加庆典。他们专程从景德镇来到平里，参加校庆，受到中共祁门县委，县政府及平里乡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三

康达一生在事业上有成就的，在政治上却是失意的。辛亥革命中，康达随林森、吴铁城光复九江，奉派为饶州知府，兼节制赣北各属巡防事宜，得定内乱。安徽省各界联席会议，虽曾推举先生（康达）为安徽都督，^[17]而据安庆地区文史资料，民国初年安徽都督名单中又无康达列名。一九一二年，他曾参与南方代表团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8]。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中（即讨袁斗争）他曾在黄兴幕下任职。因战事紧张，多日不眠，劳累过度，不幸双目失明（又叫清光瞎），医治无效，自此终身残废，失去了从政机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国外，康达如大海孤舟，听凭风浪摆布。后来依靠盟兄弟许世英，才得到一个闲职。一九一六年许

世英任交通总长，康达任交通顾问[10]。一九一九年甘肃省长张广建又委任康达为甘肃省政治谘议[11]，同年九月又被委任为当时的国务院谘议[12]，十二月又被安徽省长委任为安徽省长名誉顾问[13]。其大部分时间是往来于礼屋、景德镇、九江之间经营瓷业和林业，很少到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康达在政界已销声匿迹，每年仅向国民党政府领取约两千元的养老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

四

康达自一九一三年双目失明以后，虽仍先后担任各种闲职，实已退出政治舞台。每逢在家，不问春夏秋冬，几乎天天都由家人搀扶他迎着晨曦，在村口呼吸带着家乡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在大路上漫步，在凉亭（此亭是一九二〇年康达个人出资所建）小憩，并与在凉亭休息的路人亲切交谈。他虽然看不见大北水两岸的绮丽风光，但能听到奔流不息的河水声，听到放筏撑船的人们发出粗犷有力的吆喊声，听到林中的莺歌鸟鸣，嗅着花草散发出来的馥郁的香气。

康达一生虽曾居高官、受厚禄，生活却十分节俭。他不吸烟，不喝酒，基本吃素，穿着土布，毛巾破了补一补再用，连袜子也是用土布缝制的。他说：“土货暖和耐用”。而他为办事业、兴学校却又舍得花钱。

一九一六年以后，他一方面支持次子康定东在景德镇继续经营瓷业，另一方面在家乡大量买山、租山，接受他人赠送的山场营造用材林和经济林。他长年雇工十五至二十人从事林业生产。抗日战争时期，乡民凡兄弟两人以上的为逃避抓壮丁，多央人介绍到他门下充当雇工，为之造林。那时他虽不外出做

官，但名声在外，在祁门和赣北一带仍颇有势力。农家兄弟两人以上的只要其中有一人到他们门下，再也无人敢去抓他们兄弟，如同进了保险柜。

他把长工组织起来，分驻各个山头，长年造林、护林、育林。每到春季，雇工忙不过来，又以三升米一天的报酬雇临时工。雇工待遇有两种：一种是管家工，常年有三至四人，除与一般雇工同酬外，每人每年另发银元二十元，一般雇工的报酬是每人每天一升一筒米（合二斤一两），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二两（十六两秤）旱烟，一次理发费。另外每月十五日做一次“神福”（即吃肉）。报酬虽然微薄，农民仍然乐于受雇，原因就在于一到他家，就无抓壮丁之虞，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康达只要求造林、育林、护林，却不允许砍伐。据至今仍然健在的当年雇工介绍，康达经常对一些伙计说：“你们要安心做事，我死后这些树木都是你们的。我现在只不过是出钱而已。”一些雇工听了，感到好生奇怪，也有人问他：“老爷的树木怎么是我们的呢？”康达只是说：“以后你们会知道。”平时有人送他一点树苗或树种，不问多少，即使是几株树苗或一杯种子，他都很高兴，叫家人用猪肉酒饭招待，以示酬谢。他营造的林木有杉、松、毛竹、柏、樟、板栗、柿子、桔子、栗、扬州桃、油茶、樟、银杏、棕榈、青桐等十几个品种。一九四一年，他次子康定东在景德镇主持的瓷业公司生意不佳，向父亲要求砍伐树木出售，以弥补亏损。康达不允，并教训儿子：“这些树木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给后辈人的。”经儿子再三请求，康达只允许他在倒湖新街畔下的黄牛出洞砍伐一定数量的树木，其他地方一株也不许动。事后有人开玩笑地问康达：“老先生，你有这么多树木，你家十代子孙也砍不

完，不让儿子多砍些干什么呢？”康达回答：“你们知道国父提出的‘三民主义’吗？其中的‘民生’主要是土地问题嘛。国父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今后山场田地就都是民众的了。”又说：“如果我死后，一株树值一块钱（指银元），我植十万株树就是十万巨富，这笔财产将来都要交给民众。”

三十多年中，康达在祁门礼屋、倒湖、曲坞及赣北的城门、胡家墩的塘坞里等地营造林木二千多自然亩，计一万余市亩（注），折算成银元，共投资二万多元。解放三十多年来，礼屋、倒湖、曲坞等地村民所砍的树木，基本上都是康达当年雇工营造的。康达的子孙并没有从康达所营造的林木中得到很多好处，实现了康达“留给民众”的宿愿。土改后，农民领到土地证，原在康达家做雇工的胡永祥（文革前病故）对石善子（现居倒湖）说：“特璋所营造的树木现在分给农民了，这位老爷确实有远见。”

一九八四年元月十七日下午，笔者瞻仰了康达之墓。墓地四周青松挺拔，枝叶婆娑。他的坟墓，经过三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仍然保存完好，连无知的耕牛也不去残踏。笔者曾在礼屋一带工作八年，在实地调查中知悉：解放以来，不管是“文革”中还是在正常情况下，倒湖、礼屋和曲坞三村的农民，很少有偷砍、乱砍树木的现象。这除了有严格的管理规则外，还有康达重视林业的历史原因。

康达喜欢办公益事业。一九二二年，康达在景德镇为首集资，筹建“龙珠阁”。阁址在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山巅，故名“龙珠阁”。一九二三年破土动工，一九二五年建成。阁高三层，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气象巍峨。阁四周，绿树成荫，都